

美国的自我探索



西奥多·怀特

511
E31
279

美国的自我探索

（总统的诞生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八〇年）

西奥多·怀特著

AMERICA IN SEARCH OF ITSELF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56-1980

by Theodore H. White

AMERICA IN SEARCH OF ITSELF: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56-1980. Copyright © 1982 by Theodore H. White.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information address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0 East 53rd Street, New York, N.Y. 10022.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the Cultural Section, 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的自我探索

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出版

1984年7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翻译者: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中国 北京)

校订者: 美国新闻处(香港)

封面设计: 吴璞辉

献给
费正清

美国的自我探索

总统的诞生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八〇年)

作者小传

西奥多·怀特一九一五年生于波士顿。他曾在波士顿公立拉丁学校就读，其后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历史。他起初赢得人们的注意是在中国当战地记者；战后，他和别人合著了《中国之怒吼》(*Thunder Out of China*)一书。战后那几年，他在欧洲报道那里复兴的情况，并写了《灰烬中的火焰》(*Fire in the Ashes*)一书。他于一九五三年返回美国。

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西奥多·怀特便从事报道美国的政治动态；这主要见诸他的《总统的诞生》(*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那一套著作，它的第一卷于一九六二年赢得普利策奖。他那套著作中《美国的自我探索》(*America in Search of Itself*)一书更是顶峰之作，其内容论述当代美国政治的变化情况。此外，他还写了《信心的破灭：理查德·尼克松的垮台》(*Breach of Faith: The Fall of Richard Nixon*)和《历史的探索：个人的一次历程》(*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这两本书，两本小说，一个剧本，并搞过几出获奖的电视记录片。

怀特先生和他的太太比特丽斯·霍夫斯达特现居于康涅狄格州。他有两个孩子：海登是教英文的，戴维是新闻记者兼小说家。

西奥多·怀特著

美国的自我探索

在美国，我们所有的人都经历了一个冲突横生的时代：动乱和剧变此起彼伏，旧的观念和旧的梦想——破灭——美国政治由此而发生了根本变革。

本书是西奥多·怀特（一译白修德）论述美国总统竞选的获奖丛书的一部，书中揭示了这场变革幕后所发生的一连串戏剧性事件。他一开始就阐述了在他从事竞选报道二十五年里边左右美国政治的各种势力。他告诉读者，美国人的善良愿望如何缔造了人们所说的“伟大社会”……又如何把它推向了悬崖绝壁。

他揭露了电视影响美国政治并进而改变其性质的原委；他还叙述了令人胆战心惊的“通货大膨胀”及其破坏美国整个生活的真相。他详尽地描述了心地善良的人们欲使美国人团结起来的愿望，而今又如何导致美国人的离心离德、意见分歧和互相对立，这无情的事实同样令人不寒而栗。

而这二十五年往事的高潮则是一九八〇年的总统竞选，其中两位首要人物是：

- 罗纳德·里根，他确信美国已经迷失了方向，并指责吉米·卡特“把自己的某些言论同上帝的意旨混为一谈。”
- 吉米·卡特，性格矜持而忧郁，坚信他所处理的危机是一场精神危机。

本书还回顾了政治沿革，从“昔日美国”一直追述到现在，其中还提到了由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八〇年产生美国总统的重大戏剧性事件中扮演过大小角色的人物，其中包括：

-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正值其光辉事业的鼎盛时期，却犯下了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大错误，而结束了政治上的角逐。
- 埃斯蒂斯·凯弗维尔，他计划挽救民主党，使之摆脱政党头子的控制。
- 爱德华·肯尼迪，他一九八〇年的竞选活动毫无希望，而且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但他在失败中却闪烁出照人的光彩。
- 某些职业的谋略家，他们支配着当今的政治生活。

西奥多·怀特在谈论这些支配美国政治达二十五年之久的人物时说道：“我终于懂得，这些人都是在各种事件和政治势力推动之下崛起的，而非仅凭个人的本领。”

简而言之，本书乃是由一位杰出的美国当代政治史学家概述过去二十五年的变迁，并力图解答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美国人是些什么样的人？谁在领导我们？我们目前处于何种地位？我们要奔向何方？

西奥多·怀特著作书目

- 《中国之怒吼》(*Thunder Out of China*) [与安纳利·雅各比合著] 1946年
- 《史迪威文件》(*The Stilwell Papers*) 1948年编
- 《灰烬中的火焰》(*Fire in the Ashes*) 1953年
- 《山路》(*The Mountain Road*) 1958年
- 《从第四十层楼看美国》(*The View from the Fortieth Floor*) 1960年
- 《总统的诞生——一九六〇年》(*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1960*) 1961年
- 《总统的诞生——一九六四年》(*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1964*) 1965年
- 《恺撒渡过卢比孔河——一次政治上的决战》(*Caesar at The Rubicon: A Play about Politics*) 1968年
- 《总统的诞生——一九六八年》(*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1968*) 1969年
- 《总统的诞生——一九七二年》(*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1972*) 1973年
- 《信心的破灭：理查德·尼克松的垮台》(*Breach of Faith: The Fall of Richard Nixon*) 1975年
- 《历史的探索：个人的一次历程》(*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 1978年
- 《美国的自我探索：总统的诞生(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八〇年)》(*America in Search of Itself: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56-1980*) 1982年

目 录

开场白(代序)	1
第一部分 由此开始	
第一章 形势所迫：一九八〇年	13
第二章 昔日美国	41
第三章 一九五六年的竞选：欢呼与告别	85
第二部分 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九年美国政局的变化	
插语：人们的思想在变化中	117
第四章 “伟大社会”纲领	121
第五章 通货大膨胀	161
第六章 电视统治一切	191
第七章 卡特这位总管家	227
第三部分 一九八〇年大选面面观	
第八章 共和党人：里根出场	263
第九章 民主党：陷入迷途的党	291
第十章 一九八〇年的初选：荒唐的舞台	323
第十一章 全国代表大会：台前与幕后	357
第十二章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民？一九八〇年人口普查	393
第十三章 竞选：打破联合阵线	429
第十四章 答案和问题	473
附录：一九八〇年大选结果	501
致谢	505
中英名词对照	507

开 场 白

(代序)

不管讲什么故事，都有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从哪里开始？

这一次对我来说，选择恰当的起点尤其重要。我曾经自己决定，一九八〇年的竞选将是我从一九六〇年动笔写的一系列美国政治故事中的最后一个。当时计划每四年写一本论述美国总统诞生始末的书，直到一九八〇年为止。最终这将成为对二十四年来美国政治权力过渡情况的述评，说明我们国家是如何走过来的。所以这次我想全面汇集起来加以总述。可是又该以哪里作起点呢？

大选是重要的；这不仅因为主要是大选才使美国人感到他们参与了政府事宜，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大选使美国人感到他们处于控制地位。控制乃是一切政治的根本。不过这一次，在一九八〇年竞选中，不仅对控制地位，而且对国家宗旨本身都产生了怀疑。不知怎么搞的，公众事务出了轨，就好象美国已经迷失了方向，对未来感到茫然。政府内部没有统一的认识，对任何事情都缺乏反应，更无力实施管理。这不仅仅是卡特行政当局，或尼克松行政当局，或约翰逊行政当局的过错。事情的由来还得追溯到比我报道的这七届总统竞选还要早得多的时候。

我从事这类竞选的报道已达二十五年之久。回顾一下，这一阶段也正是美国历史上重大的变革时期之一。历史学家往往是在事后向我们解释所发生的变革的意义，此时时间的流逝早已把转瞬即逝的细枝末节淘汰尽净，而把变革的主干显露得清清楚楚。历史学家

的任务是把历史划分为各个时期、时代和纪元，使我们了解一定时间和地点中的人。我们记者则是历史学的仆人，逐日为历史学家提供不会长久留存的报道，让他们去鉴别筛选，分门别类。我不能自充历史学家。但是一九八〇年我所报道的事情却远远超出了单纯的一次大选，它必须视作是一个比我试图要写的长得多的时期内的事件的高潮。

那么还是那个老问题：究竟从哪里开始呢？

不管是搞新闻报道还是撰写历史，知名人士总是主要的描写对象，因此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把战后在政治舞台上驰骋的大批风云人物作为开头：

● 杜鲁门坦率、果断，是个颇讨人喜欢的人物。在他之后还没有一个人具有他那种讲话真率、单刀直入的本领。一次我写了封信给他，祝贺他对华政策的成功。他只是简简单单地回答我“多谢”，并且说他停止对蒋介石政权的援助是因为他发现，“我们是在把钱往一个耗子洞里头扔。他们是一帮无赖。”

● 艾森豪威尔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而且风度翩翩。在里根入主白宫以前，他是美国总统中最擅长讲故事的能手。直到他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许多年以后，我才认识到他的头脑是多么冷静而敏捷，他的思考又是多么缜密而周到。

● 肯尼迪非常潇洒儒雅。我记得一九六〇年他在大选中获得险胜以后的几个小时就说过：“尽管获胜之数是微弱的，但责任却是明确的。”

● 林顿·约翰逊曾经作了非常巨大的努力，结果却遭到惨重的失败。我记得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把手插在裤兜里挠自己的大腿根，弄得兜里的硬币叮当作响。他滔滔不绝的对我讲了一大套，可以说是给我上了一课，他一板一眼地告诉我在历史上应对他如何描述以及他的主要成就是什么。然后就突然把我打发走了。

● 理查德·尼克松是个典型的靠不住的人。他对国家的重大决

定十分认真严肃，但是在具体事情上却寡廉鲜耻。他跟任何人在一起都觉得不自在。有一次我问他，竞选时从早到晚到处跟人握手、对人微笑，他怎么受得了。他的回答使我茅塞顿开：“……你在对他们微笑的时候，心里一直在想踹他们一脚。”

我可以一个一个地把所有的候选人都描述一遍，包括竞选失败的候选人在内。这些人都是很有魅力的人物：快活开朗的汉弗莱、深谋远虑的史蒂文森、天真单纯的麦戈文、慷慨激昂的戈德华特和威严傲慢的洛克菲勒。

可是，如果说在国内外从事新闻报道这么多年使我学到了点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我懂得了，大部分名人只有在表面现象背后隐匿着的势力的推动下，才能在时局的发展中崛起。只有极少的大人物——如罗斯福、邱吉尔、毛泽东和莫内——也许能改变这些势力的方向，使自己的一生成成为传奇式的一生，成为未来发展的出发点。但是，在我见过的总统中只有一位有可能当之无愧地称作真正的英雄，是属于这类人物的。那就是约翰·肯尼迪。他改变了事情发展的方向。

因此，在一九八〇年，我不得不考虑罗纳德·里根和吉米·卡特究竟如何。在我看来，这两人的品格中似乎都缺乏那种推动历史的活力。看来他俩都是那种或是被外部力量推举上去，或是被压垮击败的人物。

卡特是在厌恶尼克松的浪潮中拥上台来的（“我希望看到我们能够再次拥有一个跟美国人民一样善良、正直、体面、忠诚、能干、富于同情心及以博爱为怀的国家”）。至于里根，他竞选总统已有十二年之久。他自己的党曾经摒弃他两次。现在到了一九八〇年，并不是他有了什么变化，而是美国人民发生了变化。美国人民已愿意聆听他对他们政府弊端的描述。

那么这样一来，便又落入以传统的论述个人雄心、作为和事件做开头而进行报道的俗套了。但是，既然我们都认为决定一九八〇年大选的各种势力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有关人物的个人风格，这种

老式的开头也就不行了。

在当代出色的历史学家看来，只有一个凌驾于其它一切之上的开头，那就是一九四五年这个胜利之年。

一切的一切都由这个胜利衍生而来，而且对历史学家来说，一九八〇年将是他们可能称之为“战后时期”的一个历史阶段的终结。

整整一个世代，人们都陶醉在胜利之中。首先是感到自己很有力量，这种感觉已经使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确信，它几乎一夜之间就能动员起来的武装力量能够也应该永远管理和重新安排整个世界。其次是一个颇有魅力的信念：相信在善与恶的斗争中，胜利永远属于前者。我们，我们的士兵，已经证明公理产生力量^①。甚至连“美德”这种必不可少的传统竟也由战争传下来。随着艾森豪威尔的部队打开了纳粹集中营的大门，美国人第一次认识到人类可能堕落到何等糟糕的地步。于是他们在政治上接受了这样一个道义上的使命：决不能再让这种罪恶重演。随之而来的就是担当起这样一个责任：不管美国人民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要照料、供养和扶持整个世界。

这次伟大胜利的副产品也同样重要。美国掌握的知识学问对这一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以致不能再忽视学者在美国生活中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批化学家的代表去拜访陆军部长牛顿·贝克，主动要求为战争效力。据詹姆士·科南特的记述，当时贝克对他们表示了感谢，然后补充说：“可是陆军里已经有了一名化学家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数学家们编排的美国密码是交战各国中最优秀的密码；电子学的奇才们使雷达技术更加完善；物理学家们则研制成功了原子弹。不仅是自然科学家，而且社会科学家也作出了贡献。经济学家们对德国和日本的工业作了精确仔细的分析；精神病学家对空军人员作了严格的鉴别。现代化的管理是在战争中开始出现的。最早的电脑专家介绍军队采用数据处理方法，并从数字

^① 原文是 Right makes Might，作者把西方讥讽霸权、原含贬意的成语“强权即公理”(Might is right)在此倒过来说成“公理产生力量”，反其意而用之。

——译注

角度对成本效率进行判断。他们计算火炮的弹道，研制炸弹的无线电引信，由此开始了数据分析，并进一步进行作战分析，从而掌握了反潜艇战术。没有这些人，这场战争很可能打不赢。这些思想家主要来自学术界，他们将继续在美国生活中取得各种官职，除非他们象中国的旧官僚那样失去了与现实的联系才会丧失这种地位。

还有最后一项副产品也是必须提及的，因为它在美国的政治演变中很少被人认识。为了犒赏参加过战争的退役军人，国会通过了一项几乎与一八六二年“宅地法”一样具有创造性的法案——“美国士兵权利法”。这是各种现代权利中的第一种。在战前的美国，上了大学就可以从下层社会步入上流社会。一九三八年，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美国所有大学的在校学生数加在一起总共只有一百二十五万。可是士兵权利法颁布后所有在武装部队服务过的一千六百万人都可由政府资助入学深造。这些人中有将近一半（七百八十万）利用了这个机会。他们注定了要改变美国的生活、文化和政治。到一九六〇年的时候，约翰·肯尼迪和理查德·尼克松双方政治班子里的人都是这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退役军人，他们取代了那些旧的职业政客。在此以前，搞政治一直是那些旧政客所垄断的职业。不久，这些退役军人中就有数十人成了参议员，数百人成了众议员。到了一九八〇年竞选，当轮到他们从政治舞台上退下来的时候，他们留给后任的已经是一个迥然不同的国家，一个政治上开放的国家。如果在里根之后不是他的副总统乔治·布什接任总统，那么里根就可能是最后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穿过军装的美国总统。如果布什继任总统，那么这位真正的战时英雄很可能作为最后一个参加过实战的美国领导人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在叙述一九八〇年的故事的过程中，本书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回过头来谈论胜利带来的这些遗产。但是一九四五年的胜利毕竟距一九八〇年十分遥远，就如西奥多·罗斯福的就任总统与阿波马托克斯^②相距甚远一样。如果把这个胜利的遗产作为本书的开头，就会使一九八〇年的竞选带上老生常谈的味道。一九八〇年的故事并不是在一个胜利的国家中展开的。这个故事是在一个滥用了胜利

的情感而丢了脸的国家中发生的；这个国家正在自我探索，寻找出路，并对自己的信仰提出疑问，因为老的思想已无法引伸来解释当前的现实了。

如果要写一本关于一个怀疑本身信仰的国家的书，又该从何入手呢？

这样一本书当然必须把六十年代这暴风骤雨般的十年作为开头，因为该年代揭开了一个试验的时代、一个有希望的时代的序幕。

一九八〇年里根的最后胜利究竟应该看成是信仰的恢复还是历史的反动，这还得取决于你如何解释六十年代。六十年代是在这样一种意识中开始的，即美国拥有无限的力量，它无所不能，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也许六十年代向七十年代的过渡可称为一个走向反面的过渡。

六十年代是以约翰·肯尼迪提出的要使美国的生活、政治和机会向一切人敞开大门这个伟大目标开始的。可是七十年代却以试图按种族、性别和民族传统把公民划分成等级类别而告终。到七十年代末，在许多涉及权限的领域内，美国已正式成为一个种族主义的社会。在力图铲除种族主义的过程中，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的政治却反而使种族主义制度化了。种族和性别现在可以决定谁有权得到提拔和谁有权得到就业机会。这一走向反面的过渡，是从试图废除用大汽车强行把幼年儿童送往根据其种族和肤色而指定的学校上学的做法开始的。但这个过渡却以坚持这种做法而告终。至少在民主党内，出席政治性大会的代表的确切比例便是由种族和民族传统决定的。

拯救美国城市的努力提供了又一个走向反面的事例。对美国城市衰败问题所动的脑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尽管花了那么多精力，

② 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县城。一八六五年四月九日，南方邦联军总司令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向北方的联邦军投降，成为南北战争结束的标志。阿波马托克斯的南军投降遗址已于一九五四年辟为国家历史公园，以资纪念。——译注

制订了种种方案，最后各个大城市还是日益陷入可悲的境地：它们或者成了赤贫者的仓库，或者成了豪富者的飞地，而最普通的文明礼貌却成了记忆中的往事。

还有一个走向反面的典型事例。六十年代开始时曾建立了一个肯尼迪委员会来审查美国大选的运行情况和经费来源。抱有良好意图的人们试图把用金钱做买卖的傢伙驱逐出圣洁的殿堂，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这些改革最后抓住了一九七二年尼克松的竞选活动，揭开了水门丑闻。但这些改革也孕育了一九八〇年的各个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把数目空前的巨额资金投入政治活动。不管是出于恶意的动机还是善良的意图，这些委员会使用金钱来购买政治影响力和试图影响国会及总统的做法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现在买通各种路子已是公开的事情了。

从六十年代向七十年代过渡乃是一种含糊不清的提法，因为美国人习惯于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这种划分年代的方法来考虑问题，好象每逢一个末位数是零的年份，历史就翻开新的一章，而十年后到了另一个末位数是零的年份，这一章就结束了。然而政治暗流却并非如此。例如，动荡的六十年代就是从一九六三年约翰·肯尼迪之死开始，以一九七四年尼克松下台而告终的，历时十年零九个月。

处于动荡核心地位的是自由派思想，而决定动荡方向的则是在国会、学术界、报界、电视界、大的基金会以及“思想库”里自由派的压倒优势。共和党人任总统时与民主党人任总统时一样，自由派的这样一个思想总是处于主导地位——政府的责任在于拟订方案并为这些方案拨款，以保证凡国内外认为正确和正义的事情都能得到实施，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也不管良好的意图与普遍存在的现实之间有多大的矛盾。六十年代最有影响的自由派人士之一，当时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约翰·加德纳曾提出比任何人都更加明确的警告，他提醒他的朋友们说：“有那么一些人，我觉得他们把社会变革看得跟自动售货机一样。你投进去一个硬币，就有一块糖出来。如果你遇到一个社会问题，你通过一个法律，于是问题就解决了。”

这种自由派思想的问题在于，当自由派们回顾往事的时候，他们分不清什么是他们真正的胜利，什么是他们的失败。他们在八十年代的危险是他们做过的好事也许会被他们所犯的大错误统统抵消掉。

总而言之，当我回顾我就六十年代的动荡及其给七十年代带来的后果所作的报道时，我才认识到我当时忽视了政治领域中思想的蜕变所起的作用。可是现在再回过头去分析这些思想已经为时过晚，因为它们已经改变了美国，并使现代总统中最坚持自己意识形态的罗纳德·里根当选。

以论述思想开始的故事，对一个实地采访记者出身的作家来说，并不是一个恰当的起点。

这本书既是一个总结，又是一个故事，因此我必须选一个主题和一个日子作为开头。而无论是主题还是日期，都不可能完全由人杜撰。

也许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会同意，这个主题必须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的一九八〇年的大选。可是，确切地说，究竟是什么东西在结束呢？是美国在全世界的权力在结束？是一个延续时间过长的政治体系在结束？是六十年代那种力图遵从善意，结果反把它禁锢在一整套谁也无法理解的条例法典之中的良好意图在结束？还是有希望的政治在结束？

在我看来，一九八〇年竞选所争论的焦点就是联邦政府的权力究竟是什么性质。竞选所围绕的问题，就是政府干预的后果和政府权力的范围，也就是把公众利益与个人权利区分开来的模糊界限。还有就是在动荡混乱的外部世界中美国的声誉和美国的作用等问题。

所以最好是任意选择一个具体日子作为开头来讲述我关于选举的最后一个故事，但这个日子必须与一九八〇年发生的事件相距很近，同时又要具有相当的意义，足以让读者在这个日子与产生各个候选人的种种势力之间自由徜徉与玩味思考。

这个日子就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现在这本书就从这个日子开始，以此作为一九八〇年行动的开端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虽然